

提升城市创新力,要有怎样的“母机”

——陈宪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的演讲

思想者小传



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,兼任中国城市学会副会长、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。

近几年来,有关城市(地区)分化的话题引发学界较大关注。纵观全球,科技创新迅猛的国家,如美国,最近20多年这种现象尤为明显;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,如中国,这10年左右也呈现类似的格局性变化。

某种程度上,城市因为资源禀赋、发展定位等不同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是正常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关注这一现象呢?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城市分化与城市化、新经济的关系。

无论在主要发达国家,还是发展中大国,城市化都日益表现为向大城市集中、向城市地区(都会区或都市圈)集中。有两个数字可以佐证:美国大约一半的就业岗位分布于仅1.5%的国土上;东京的面积约占日本国土总面积的0.6%,却聚集日本全国1/10的人口。

事实表明,城市化进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,但仅凭城市化并不能保证每个城市(地区)的繁荣。那么,在全球最近20多年、中国这10多年,保证城市(地区)繁荣的基本因素是什么呢?答案似乎是一样的,那就是城市(地区)进入新经济即新兴产业的方式和速度。也就是说,城市(地区)创新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城市(地区)的繁荣程度。

可是,问题又来了:为什么有些城市(地区)较快地提升了创新能力、发展了新经济,有些却没有如此大的进展,或者慢了几拍?这次演讲就是要通过美国和中国的案例、数据,试着来解答这个问题,并就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,提出个人的几点建议。

本版稿件选自上观新闻“思想汇”栏目
栏目主编王珍邮箱:shhgcsxh@163.com

旧金山和洛杉矶起点相似,为何后来出现较大发展落差

原因相互强化的反馈模式,决定着重大事件或现象的发生。同时,经济学家达龙·阿西莫格鲁在面

对“为什么并非整个世界都已经发达起来”问题时,将原因分为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,增强了对问题的解释力。

直接原因是投入,投入水平决定了不同的增长。但是,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积累了更多的实物资本,进行了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,开发和采用了更好的技术?可见,投入水平只是经济发达程度差异的直接原因。决定投入水平高低

的因素是根本原因。阿西莫格鲁将根本原因归为三个假说:地理、制度和文化的假说。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,地理假说失去了解释力,但这一因素仍然是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充分条件。阿西莫格鲁进一步将制度假说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掠夺性制度,包容性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达的必要条件。文化因素直接决定投入水平,如各国或地区企业家精神的丰富程度不同,导致投入水平的差别;同时,通过改善制度条件,作用于市场环境和创新生态,进而影响

经济增长。

通过上述理论、观点,我们来看一下旧金山和洛杉矶这两座城市经济分化的根本原因。关于洛杉矶的衰退,人们经常列举的原因包括,冷战结束使它丧失了大部分航空业、南美洲的低技能移民蜂拥而至以及政府政策的失误和失灵。关于旧金山的成功,人们多半认为,它中了信息时代的头彩,一举成为技术革命的世纪中心,并拥有大量高科技移民。

但这里有一点没有解释清楚,为什么两座城市起点相似、条件相同,却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落差较大的分化?一个根本原因在于,“两个经济体重塑其社会和经济网络的不同方式、两地企业的不同做法以及各经济体中不同的总体组织生态。”

所谓总体组织生态,就是现在所说的创新生态系统。创新生态系统的“输入端”是新创公司,“输出端”是战略性新兴产业,另外还有创投公司、高校、科研院所、政府机构和中介服务等组织参与其中。所以,创新生态系统内在包括创业生

态和产业生态。

什么是社会和经济网络?它就是生态系统中的各种“链”,如行业链、配套链、服务链和社交链等。创新生态链的发育状况以及起作用的效果,决定着新创公司的成功率和新兴产业的规模。简而言之,正是由于旧金山地区不同于洛杉矶的组织生态(创新生态)、时代精神和商业领袖的智慧,决定了它的繁荣和成功。

为什么创新生态最为根本、特别重要?就像在自然界,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,决定着人类活动的可持续性;人类的生活质量。在经济活动中,人们经常强调营商环境的重要性。生态亦是环境,是系统意义上的环境,所以称其为生态系统。

将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借用到创新创业、产业发展活动,是十分贴切的。它特别关注类似生物群落中的“物种”——新创公司,它们是创造财富和就业的源头活水。同时,又特别注重生态链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。举一个例子,智能化的新产品,如机器人、无人机,它们产出过程的效率就是由研发、样品和量产的配套链质量决定的。

中国城市的东西差距逐渐缩小,为何南北分化却在扩大

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:近10多年来,经济发展在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之间的分化日益显著。根据“秦岭—淮河”一线为划分南北的标准(不含港澳台地区),南方地区大致涵盖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重庆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,共12个省、1个自治区和2个直辖市;其余省、区、市则为北方地区。

2018年,经济总量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中,北方城市有2个,分别为北京和天津;其余均为南方城市,分别是上海、深圳、广州、重庆、苏州、成都、武汉、杭州。如果看排名前20位的城市,北方城市再加3个,青岛、郑州和济南(含原莱芜市的两个区),其余均为南方城市。在全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前20名的城市中,北方只有北京。

我查了一下1978年和2000年的数据。1978

年,经济总量前20位的城市,北方11个,南方9个。可见,在改革开放伊始,中国经济还是北方强于南方;2000年,北方还有7个城市。

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,南北方GDP增速的差距在2013年只有0.3个百分点;可到了2017年,这一差距扩大到了1.9个百分点。北方GDP总量在全国的占比,则从2012年的29%下降至2017年的25.2%。

上述数据及相关数据表明,以城市分化为表征的南北差距在拉大。应当说,这一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,只是不那么显著。最近10年左右,差距拉大在加速。

毋庸讳言,这一现象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上,尤其是在创新驱动背景下产生的。一般认为,南方文化比较容易亲近市场经济制度。这些年来,我一直在关注创新创业,发现了一个有数

据支持的事实:中国的创业指数(3年累计新增私营企业户数/15岁至64岁常住人口总数)呈南北低分布。按照城市计算,最高的是深圳,它甚至是北京、上海的3倍。虽然无法用单一的理由来解释这个变化,但城市创新力一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进一步来看,城市或地区的差距扩大,主要是客观因素造成的。这里的客观因素主要是指人性的因素,人往高处走;市场的因素,资本流向获利高的地方;还有历史的因素,即文化的因素。

对于客观因素的作用,不必也不能进行干预。而且,它们还会持续地起作用。坦率地讲,在人力资本、技术进步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断加大的背景下,分化和差距可能还会继续加剧。那么,这是否意味着试图缓解分化、缩小差距的政策性措施会失效呢?答案是否定的!

深圳“好的大学”不多,为何能集聚创新资源和新兴产业

改革开放以后,我们充分认识到区域不平衡这一基本国情,同时遵照要素自由流动这一市场规律,从建立特区、新区等完善改革开放空间布局的举措入手,发挥中心城市和大城市资源要素集聚的功能,形成增长极,再辐射周边地区,推动地区一体化发展,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地区差距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,也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加以缓解和逐步消除。

如果说文化差异是创新驱动背景下城市(地区)发展分化的主要原因,那做些什么才能遏制这一趋势呢?创新文化的形成,根本上是人的作用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移民国家或城市往往更容易成为创新国家或城市。

移民文化与创新文化有着天然的耦合。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,大规模移民几无可能,小规模移民的可能性则主要来自大学。放眼世界,创新资源和新兴产业集聚的城市或地区,一般都有能够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大学,就像硅谷有斯坦福、波士顿有麻省理工和哈佛,硅砾有特拉维夫

和以色列理工等。

人们可能会问,深圳好大学不多,为什么能够成为创新资源和新兴产业集聚的城市?一如移民是创新创业的充分条件,好大学也是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,创新生态才是必要条件。过去40年里,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;近10多年来,深圳进一步形成了良好的创新生态。现在,深圳已经充分认识到好大学的重要性,而且有了好大学的“幼苗”,如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、南方科技大学以及其他好大学在深圳设立的校区,等等。

在中国创业指数南高北低的分布中,为什么北京可以达到和上海、广州大致的水平?一个关键因素就是,北京有好大学和好的研究机构。中国南方的几座省会城市,杭州、武汉、成都、长沙、合肥近年来的较快发展,也与这些城市有较好的大学有关。

因此,一座城市无论如何得有人才的“母机”。好的“母机”就是好的大学。所以,不遗余力发展高质量的教育,在城市办好大学并吸引人

才、留住人才,不仅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举措,而且是缩小地区差距的重要措施。

当然,在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,还有其他措施,如行政区划调整、区域规划优化、加大干部派遣交流等。这些都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具体体现。但要充分认识到,对于区域协调发展,始终要注重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

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资源优化配置,即价格一般不被扭曲条件下的配置。在一定阶段,这样的资源配置过程会拉大地区差距甚至加剧城市分化。但再经过一定的阶段,市场的作用,辅之以公共政策的作用,如更加公平地发展义务教育、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及社会保障等,我们将会看到地区差距的缓解、城市格局的相对稳定。

这样做,也许所需时间会比较长,但无论过程还是结果都将是比较良性的。这也就是说,对于区域协调发展,需要政府有所作为,但更加需要谨慎作为、有效作为,其检验标准就是能够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。

优秀党员、市级劳模为您服务

★装饰装修施工三级资质

云安 装潢

服务专线: 400-021-2956

详情请点击 www.shyunan.com.cn

特别推出新居装修

60m ²	88m ²	128m ²
4.88万元	6.18万元	8.28万元

※ 总部:浦东新区东方路1381号蓝村大厦22楼B座 电话:50897001 50898079

宝山/静安	徐汇/闵行	普陀/嘉定	浦东/金桥	杨浦/虹口/黄浦	静安/长宁
共和新路3308弄22号2楼	古美路35号3003室	曹安公路1550号412室	长岛路1201弄25号	大连路791号	定西路1016号19层E座
E座(近美兰建材超市)	(近莲花路)	(轻纺市场隔邻)	(近台儿庄路)	(周家嘴路口)	(近昭化路)
56033286	34228046	69186409	68953429	65356973	62263856

解秋日报 消费市场 专版

刊登内容: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
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品牌人物
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教育出版
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

电话: 021-22898552

战上海

刘统 著

困难堆积如山

解放初对上海资产阶级的团结改造,表现出以陈毅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斗争艺术。只要是爱国的、愿意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的,共产党都给予支持和帮助,和他们交朋友。但是对资方唯利是图的投机行为,则进行坚决的斗争。这就是当时的统战政策。同时,通过促进生产,增加税收,使上海工商业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,这也是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成果体现。

1949年6月初的上海“银元之战”初步打击了金融界的投机势力,让人民币在上海站住了脚。但是市场没稳定多久,新一轮的“米棉之战”又开始了。

解放前的上海是个开放型的国际城市,由于海运的优势,上海的粮食和棉花60%依赖进口,石油则100%依赖进口。上海工业的原料也大部分依赖进口。这个现象是因为上海工商业外资居多,民族工商业相对薄弱形成的。上海解放后,国民党军队虽然撤出,但是他们以舟山群岛为基地,对上海实施封锁。自6月23日国民党海军在长江口布雷和派军舰封锁,外国轮船无法进入吴淞口,原来繁忙的进出口贸易完全中断,不可避免地对上海的经济和人民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。

1948年到1949年5月,上海经济的最大特点是物资短缺、通货膨胀导致的投机盛行。国民党货币体系的崩溃,百姓完全不相信纸币,发了钱赶紧去购买物资,只有实物囤在手里才能放心,上海南京路的商店里连袋皮大衣都抢光了。商人也囤积居奇,只要和生活有关的东西,见货就囤,等着物价上涨。经营实业的资本家也无心经营企业,把流动资金也投入抢购囤积商品的风潮之中。这种畸形的市场和消费心态,就是上海解放后共产党面临的现实。

陈毅接管上海后,马上面临如何养活上海500万人口的严峻局面。国民党卷走了所有银行储备,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仅剩下少量存款。粮食和煤的储量仅够维持半月之用。国民党在逃跑时掠走了大部分轮船,铁路因为战争原因尚未完全恢复。对上海新的物资运输供应体系尚未建立,真是困难堆积如山。

6月11日打击证券大楼投机商之后,随着银元和黄金硬通货禁止在市场流通,物价随之下跌。但是到6月底,物价再次上涨,基本到达6月初的水平。

为了平抑物价,保证上海生活必需品的供应,上海市向中央求援,从各解放区向上海大量调运物资,恢复铁路和内河航运,成为当务之急。

航运方面,军管会航运处接管单位计有国营招商局、中华拖驳公司、中国运输公司、交通部船舶修理所、台湾航业公司上海分公司、浦东造船厂及上海港务工程局、上海港务整理委员会等,各种轮船共278艘,总吨位达14万吨。尚有在长江沿线及华北解放区港口119艘,约占其总数的66%。国

民党溃逃时,强迫拉走大批船只,并将不能带走的船只破坏沉没。航运处接管第一天,即迅速恢复各线通航,一面接管,一面筹划复航。

浦东修船厂全体工人每天工作到晚上10时,修理“江陵”号,终于在6月2日第一艘复航轮船驶往汉口。为打捞被国民党军沉没在黄浦江里的船只,航运处邀请上海航业界通力合作,组织打捞修理指导委员会,经过1个月的努力,打捞出水的有“闽南”“民权”“生民”等大小轮船47艘,并积极打捞其余船只。

铁路方面,国民党军溃逃时,沪杭线大桥7座曾遭破坏。除公开破坏之外,还留下特务进行暗中破坏。

在恢复通车中,铁路员工组织修桥工程队抢修铁路桥梁,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。在抢修沪杭线二号桥时,在铁道工程团协助下,员工们喊出“通车第一”的口号,奋发努力,昼夜抢修。在铁路员工及铁道工程团努力下,本来预定八天的工程,六天即告完成,上海至松江间交通于是恢复。

铁路、航运恢复后,各地的粮食、棉花、煤炭源源不断运往上海,最先得到缓解的是煤炭供应。上海解放前的1948年,全年

烟煤需要数量为1214199吨,其中:开滦煤676097吨,占55.65%;台湾基隆煤343081吨,占28.24%;华东煤118811吨,占9.78%;外国煤(日本、苏联、美国)进口54733吨,占4.51%;淮南煤最少,为22077吨,仅占总数的1.82%。

解放后煤炭来源发生很大变化,基隆及外国煤总数约40万吨不能运到,但是山东贾汪、淄博煤区均可运沪接济。上海解放后,人民政府规定煤炭供应以公用事业为首,公营企业次之,再次为私营企业,煤商不作分配对象。为调剂煤源起见,政府鼓励有运输能力者直接到产区购运,所以在产区交货煤炭的价格特别便宜。因海运船只大部分被国民党劫去,北煤南运比较困难。但是平沪铁路通车及运用内河航运水驳运输满足了煤炭供应需求。自1949年5月下旬到8月20日的3个月中,江北各矿(淮南、贾汪、淄博各矿)共运了近50万吨煤供应长江各大城市,其中运到上海的就有24万吨,已经初步解决了上海的燃料问题。

但是粮食问题没那么容易解决。当时解放战争还在继续,几百万解放军需要大批军粮,长江以北的农村生产水平落后,粮食产量远不如江南,战争之后的恢复重建也刚开始,所以征集粮食绝非易事。解放上海之前,江淮地区就已经征集了大批粮食,供应刚刚解放的上海。

应该指出,这是解放区战争动员的方式,只能是临时的,不可能常态化。而且大米的供应远远满足不了上海的需求。在上海的求援下,北方的小麦也被征集起来,运往上海。上海有加工面粉的工厂,此时因为外国进口小麦来源断绝,处于停工状态。把这些企业盘活,既能解决上海的粮食供应,也能让企业复工产生效益。7月,上海八大面粉厂开工,日产面粉5万袋。

(四十四)

连载